

内 容 简 介

《独立评论》政论时评周刊。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243期。十六开本。胡适等人主编。主要撰稿人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著名教授、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蒋延黻、任鸿隽、周炳琳、陈衡哲等。该刊以登载政论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游记、杂文、书评。另设有“问题讨论”一栏,经常开展有关政治、教育、妇女、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民主与独裁”的论争、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讨论、中西文化的论争、对日政策的讨论在当时有很大反响,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责任编辑 鄢琨

封面设计 谢颖

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之三

独立评论

(1—243期)

胡适等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199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25.5

字数:5828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80520-807-7

G·145 定价:8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乡禾屯村 邮编:101500

論中日交涉

微塵

近數句來的中日交涉似乎已陷入極端沈鬱的空氣之中。現在交涉之門雖然還未曾閉塞，桑島須磨仍然來往於南東京之間傳遞訓令，張外長與川越大使還有會面的可能，中日的僵局似乎是不能打開的，雖則正式決裂的時期似乎還未達到。

這次交涉之漸入於僵態是容易明白的。在中國方面，我們已到了再不能讓步的關頭。自從東北事變起直到今日，五年之中我們不知讓了多少步；但是我們每讓一步日本便進一步，無理的要求答應了之後還有更無理的要求。我們的政府在這步步退讓之中受到國人種種的非難。中國的人民不能容忍一個只會喪權辱國的政府。所以在日本當局提出「調整中日邦交」的辦法時，我們朝野上下都是極端歡迎的，因為我們願意與日本正式的外交代表把中日兩國的根問題加以一番全盤的調整。但是我們心目中之所謂調整不是請求日本再向我們提出一套無理的要求，不是再作一番喪權辱國的交涉，而是將中日兩國間的一切糾紛作一次總清算，尋找一條「安定東亞」的路線。我們愛好

平和，但我們也愛護我們的國土與人民。我們不能以我們國家的命脈為和平的代價。日本果亦愛好和平，我們願意與他開誠磋商。但此項磋商應以調整邦交為原則，而不是再度的屈辱。我們不特是已經達到了再不能讓步的最後關頭，我們前此被迫而接受的屈辱我們希望能用外交的方法將其調整。以前日本所得到的利益使得中國與日本永立於對敵的場合；我國苟須永遠屈辱於這些條件之下，中日的邦交是永遠不能好轉，中日兩國是永遠不能提攜的。我們希望掃除中日兩國感情上的障礙物，建造一條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坦坦大路，所以我們歡迎調整邦交的提議，希望憑藉着外交的方式我們能使中國人民對日的仇恨心理能夠掃除；而仇恨心理的掃除端在日本能尊重我國的主權及國格，不特不再做強盜式的攫取，詐騙式的威脅，并且把以前由攫取及威脅所得到的利益交還給我。我們此時并不是要求日本把五年來的收穫一齊交還中國。我們是實際主義者，所以我們不存過分的奢望。我們只要日本澈底了解中日邦交的調整是以開誠交涉為方法的；為表示日本對於這

種方法的誠意，日本應將近年來在華北所造成的局面——用威脅收買欺詐恐嚇所造成的局面，從根本上加以改造，把塘沽協定以來的種種損害我國主權的設施一體消除。如果日本能做到此點，中國的人民便明白日本對於用外交方式來調整邦交的方法是有誠意的，以後外交之門便永遠不致閉塞，中日邦交也便走上了康莊大道，在這條大道上我們把一切的糾紛一一加以解決。我們既以這種態度來接受日本調整國交的提議，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再行對於日本無理的要求讓步；但不肯再行讓步，我們并且還提出我們認為中日邦交的障礙物來請日本將其掃除。我們的人民近來對於政府處置中日問題的態度表示相當的滿意，願意竭力為政府的擁護，便是因為政府現在已看清了此點。政府已明白的宣示不能再度讓步；政府對日本已提出上述的障礙來要求日本掃除。

但是這次的調整邦交提議雖然出自日本，日本對於所謂「調整邦交」的看法却與我們的看法大相逕庭。日本之所謂調整邦交不過是提出一批新的無理要求的別名。日本一方面表示中國所提出的條件他們簡直不予以考慮，一方面更要求中國政府答應許多比以前的無理要求更無理的要求。日本要求在漢口駐兵；日本要求華北五省的「特殊化

」；日本要求中國與日本共同防共。在漢口駐兵是現有條約所不許的；漢口是中國國防中心的咽喉，日本在那裏駐兵等於把中國的咽喉握住。華北五省的「特殊化」等於華北五省的「冀東化」；冀東的偽組織我們已經提出抗議認為侵害我國的主權，華北五省的「冀東化」是中國主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損失。共同防共顧名思義是絕無理由的，日本之提出這點要求便是要憑藉着防共的名稱來實行統制着中國的國防設備。在提出這種要求時，日本并且在我們各地大肆武裝遊行。在上海他們超越租界的範圍佈防起來，置我們的抗議於不理。在平津一帶他們的軍備大肆練習「攻陷北平」的戰略。同時日鮮的浪人在到處走私，販賣毒品，強佔民房。這些要求和伴着這些要求的威脅恐嚇，使得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深切地認識日本之所謂「調整邦交」不過是大規模的奪取中國的土地侵損中國的主權的烟幕彈。在這種惡劣的空氣籠罩之下，張外長與川越大使的談判無疑地是不會有結果的。

以上所說足以証明中日此次交涉，因為雙方對於「調整邦交」的根本認識不同，故陷入現在的沈鬱空氣之中。我們中國人現在無須規勸日本之所謂「明達之士」呼他們認識這個難關而謀其打破：日本「明達之士」也許所在多

有，但他們的棉薄之力，於事無補的。即使他們有清楚的認識，這種認識也沒有影響所謂「國策」之可能。日本的「國策」是什麼我們也可以不必去過問；因為「唾手可得」的好處是沒有「國策」的國家都不肯放過的，何況一個有早已注定的「國策」的國家。我們現在的立場便是希望政府，鞭撻督促政府，堅決地抱着前此的主張，以不折不扣一步不讓的精神與態度與日方廣續談判。政府須要認清，無論政府之所謂「最後關頭」在那裏，中國的人民是全體一致地，堅決的不肯容忍再對日本作一絲一毫的讓步。我們同日本辦理交涉，是希望從交涉裏我們能貫徹我們的主張。我們不是爲交涉而交涉；更不是無論如何都得交涉。交涉如果與我有利，即中日的邦交能依我們上述的認識而得到一種調整，我們當然廣續交涉。交涉如果只是等於再度讓步，交涉的結果只是大規模的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那麼我們何貴乎交涉，何必交涉？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交涉的態度是一視交涉的成績而定的，也可以說是一視日本對於交涉的認識是否轉移而與我方的認識接近而定的。我們堅決的抱定我們的主張，牢守着我們的陣綫，絕對不作任何的讓步，是提醒日本最好的方法，是使得日本

明瞭我們的立場唯一的方法。中日交涉的轉向皆視我們的主張是否堅決，我們的陣綫是否牢固。不久以前日本有一位新聞記者到中國來，他說在中日交涉的緊急關頭，中國的人民是鎮定的，日本的居留民倒恐慌起來。日本在華的居留民向來是主張激烈的，他們向來請求他們的政府「積極對華」。日本的資本家向來是主張向中國投資壟斷中國的市場爲經濟侵略的。但是在這個雙方調兵遣將的時候，日本的居留民也恐慌起來：交涉失敗對於他們是最不利的。日本的資本家也不願在中國投資，日本軍部也沒有資本可投，華北的「經濟合作」講來講去還只是日本叫中國人投資歸日本節制，有利日本享受，無利中國吃虧而已。所以只要我們的壁壘森嚴，保持着最大的決心，以明顯的事實表現我們的立場，荆棘叢叢的中日難關或者還有打開之一日。若果我們依舊是敷衍延宕，拿不定主意，還是使日本相信中國之事只要威脅便能唾手而得，那麼這次的「調整邦交」的結果只有是使中國的國土與主權更作一次鉅大的創傷，中國人民對日仇恨的心理更加一層的深刻而已。這樣的交涉又有何益呢？

廿五年十一月一日

中日外交緊急感言

趙錫麟

顧亭林先生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真是興亡之時，我輩匹夫，不可不負一部份之責任。英國政治學者拉士基常言：「若言論自由爲有價值之物，則在緊急時期，應當充分利用。」現在到了非常緊急時期，我們不可不充分利用言論自由來說幾句真率話。

中國與日本爲同種同文之國，本無自相殘殺之必要。若能通力合作，反可共存共榮。所以彼此仇視者，直率言之，由于日本之侵略。我們素知日本侵略中國之事實，但未遑深究其侵略之動機，以致一味咒罵，但終無法解脫。爲今之計，宜深究其侵略動機，爲釜底抽薪之計。日本不乏明達之士，未嘗不能懸崖勒馬，改弦更張，以免戰禍。如中日兩國，皆被其禍。萬一不成，則責有攸歸，我已盡廢戰之力，而彼方不悟，一味強橫霸道，以最殘忍之戰爭加諸吾身，吾人爲人格計，爲國家民族生存計，亦爲世界人類正義和平計，惟有悉索敝賦，與之周旋耳。戰固亡國，和亦亡國，與其和而亡，孰若戰而亡之爲快耶！況我國軍力，日益增進，國際形勢，日益有利于我，未必一敗

塗地萬劫不復耶！

日本侵略中國之動機，首當推畏懼中國之進步。邇來日人常談我有「恐日病」，提到日本，便有談虎色變之慨。其實日本自己亦有「恐中病」。他們看見中國如是之大，人民如是之多，文化如是之悠久，寶藏如是之豐富，進步如是之速。同時想到日本國土之小，天然原料之少，與夫日本歷代侵略中國所種下之深仇巨恨，那有不心驚胆寒之理。在國際紛爭局面下，「鄰之厚，君之薄也」，這句話乃是當今政治家之心病。他們自然想到，一旦中國翻身爬起來，找日本復仇，日本如何抵擋得了，倒不如乘此機會把中國打下去，使其永遠不能報仇雪恨，並且佔據滿蒙大陸，安定日本經濟立國基礎，那時，任何國家，他們都可以不怕了！關於這種畏懼心理我們應當老老實實向日本人說，我們不算舊賬，只顧將來；以往彼此互相侵略，成爲國際慣例；今後通力合作，共存共榮，化干戈爲玉帛，開國際合作之新紀元。所有不負責任之宣傳，足以引起日本之疑懼者，皆在取締之列。「攻心爲上，攻城爲下」，

這就是攻心之法。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二動機爲人口過剩。說來也好笑，日本人安土重遷，不適于滿洲天氣水土，難與中國東北勞工競爭，結果，大吹大捕的向我東三省移民數十年，只移去三十萬人。而其本國人口每年增加八十萬。數十年所移之民，不及每年增加之半數。如是而欲以佔據東北爲解決其人口過剩之道，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可是日本人不顧邏輯，不管事實，天天拿人口過剩作侵略滿洲之鐵鑄理由。按諸事實，匪獨佔據滿洲，不能解決其人口過剩問題；卽征服全中國，而其人口過剩問題，仍然存在。何也？不見彼移民東北數十年之成績耶！經數十年之久，方移三十萬至東北，若移三百萬至中國全部，則非數百年不可矣。其于日本增八十萬之人口問題有何幫助耶？吾人對此，應根據事實，指出日人宣傳錯誤，空中樓閣，自欺欺人。解決之道，不在侵略中國，而在提高生活程度，節制生育，與發展工商，增厚經濟力量。關於這一層，我們中國大大可以幫助日本，因中國有深厚富源與廣大之市場，可以供給日本原料與推銷日本工業品也。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三動機當屬經濟性質。他們需要原料，而本國原料不足，尤其是工業化必需之鐵與油。他們

需要市場，而本國市場不夠，非往他國尋求不可。中國近在眉睫，面積廣大，雖未開發，而寶藏甚富，可能性極大；人口復衆，雖日下貧窮，購買力小，而將來前途，未可限量。對於日本原料市場兩種需要適能充分滿足。兩國合作，遵循普通經濟供求原則，平等交互，兩得其益，無一受害，豈非美事？奈日本人恆欲憑藉武力，以佔中國便宜，以取得經濟上優越地位。一方面傷歐美之感情，一方面失中國之歡心。一旦走到極端，戰禍蔓延，中國固遭瓦全之禍，而日本亦難免玉碎之虞。試問近代戰爭，勝者只有利而無害耶？況自經濟方面言之，戰爭乃殺雞求蛋之道，緣木求魚之舉乎！現日本人要求與我經濟合作，吾人應歡迎之，但勿忘平等交互原則，經濟供求定理，不可威脅，更不宜有戰爭。經濟「合」作，非經濟「獨」作，應以聯絡感情爲第一步也。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四動機，由于中國政治不上軌道，四分五裂，羣雄割據，法紀蕩然無存，政府失其威信。堂堂五千年古國，墮入內戰漩渦中而不能自拔者二十五年，何怪乎鄰國之垂涎乎。「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中國之有國難，乃中國自招之也。夫東北四省，膏腴之地，森林礦產，素稱富饒，且握歐亞交

通樞紐，爲列強角逐之場。中日既已交鋒，日俄又曾決戰，險象環生，殷鑒不遠。而我之軍閥政客方事內爭，無暇外顧，人民復無政治知識與能力，只能爲人魚肉而不克作主人翁。保國衛民力量非常薄弱。同時滿地寶藏，亟待開發，而我不能開發。則我東鄰之越俎代謀，喧賓奪主，升堂入室，侵略併吞，本無足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負東北守土之責者妄持「不抵抗主義」，一誤再誤，日蹙百里，以致有今日山河改色長城自壞邊烽日急之慘象。雖然，「寒翁失馬，安知非福」。中國之紛亂，固招日人之侵略，而日人之侵略，亦促進中國之統一。若無國難，則今日之精誠團結統一和平，不可得也。自茲以往，日本欲求如往日侵略之便宜，爲不可能之事。而往日侵略之結果，即造成將來仇視之險象。中國今日之國力固不足以言收復失地，甚至並許多未失之土地而不能守。但謂毫無抵抗能力，可以無代價無犧牲而根本消滅之，則與事實不合。

論安定東亞的可能路線

宋士英

嗟我東鄰，善于謀我，當亦善于知我。彼之武力，可以取我之土地，但不能得我之人心。我之人心，一日不死，則彼之掠奪，不能一日安然享受也。國際戰爭多矣，原因衆矣，而侵略土地爲其中之一重大原因。自國聯成立以來，會員有互相尊重領土之義務。非戰公約成立以來，戰爭可不復爲國家政策之一工具。人類進步，一日千里。有識之士，咸額手稱慶。一旦瀋陽炮響，我東鄰舉人類數千年來最高之進步成績一蹴而毀滅之。我固倒楣，日亦瀕危。戰端再開，弱者固受魚肉，強者亦犯此險。循環戰爭，兩敗俱傷，得不償失。人類浩劫，莫此爲甚。日破此例，我若曲就，適成從犯。既喪失國家土地，復破壞世界和平。凡我國人，稍有血氣皆當誓死力爭失地。同時亦望我東鄰考慮，武力造成之局面，隨武力爲消長，非正當之解決，永不得吾人之接受也。

在本刊二二四號，光欽先生設計了一條「安定東亞的可能路線」，這條「可能的路線」，我們研究再三，總覺

得他「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話，日本人也不成其爲日本人了，那裏還有什麼東亞的安定的問題，更何用我們來設

計什麼路線？

「要爭端得到解決，必須使各方當事者滿足其意願，至少亦須其意願得到相當的滿足。」這個前提，誠如光欽先生所說「是一種一定不易的原則」，絕對沒有疑義；但是日本的意願究竟是什麼？光欽先生却似乎弄錯了。他說：「日本的意願看來不易滿足，但是他的實際需要也並不是不能滿足的。日本因為地小人衆，資本主義的制度極度發達，因此有向外發展的要求，他們的大陸政策便是以這種要求爲根據的。」經濟儘管是國際糾紛的主要原因，但絕不是國際糾紛唯一的原因，而且因狹義的國家主義，狂瘋的法西主義，所促成的許多國際糾紛，與經濟不過是一種微末而又微末，間接而又間接的關係。「經濟史觀」論者，以爲歷史或人類活動，都由於經濟上的因果關係，而自有他必然的軌道，因為他們相信一切行爲現象都是「必然」的，所以侵略，剝削，壓迫，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自無所謂責任。國家主義者於是利用這個學說，發明所謂「生命線」，獎勵人口繁殖，偽造統計數字，這幾乎成了國際間通用的煙幕彈。日本自從得了東北四省以後，不願意把事情鬧得太滑稽，覺得不便一味使用這種煙幕彈，於是又發明了許多非經濟的理由，所以現在中日交涉的關鍵

，并不在經濟合作，也不在「大陸政策的實施方式」，而是在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及所謂共同防共問題。如果光欽先生以爲這兩項要求的最終目的，仍在「以軍事的壓迫，來掠取政治的權力，以政治的權力，獲得經濟的支配」，日本人的「迂迴的辦法」，真也似乎太「迂迴」笨拙了，日本人即使迂迴笨拙，恐怕也不致於迂迴笨拙到這步田地罷。

光欽先生不只是太小看了日本人，而且也太重視了我們自己的政府。他以為目前交涉之所以頗有「弄成一種僵局之勢」，部份的是由於我們政府，「不但不肯賠笑臉，且壓根兒不願吃耳光」，所以他「建議設立一個三國經濟會議，而謀中日俄三國經濟的調協」，弦外之音，就是說，在經濟調協的磋商中，中國政府不妨「賠個笑臉」，不妨「吃個耳光」。這個建議，我很担心他呼中日雙方的外交當局看了，要笑死愧死。中國政府對經濟提携，經濟合作，早示讓步，人所共知。到了今日，光欽先生才來提醒政府要看別人的顏色，知進識退，不要一味肆意倔強，這直使我們覺得他所設計的這條路線，不但是一條不可通的路綫，而且是離題太遠了。

中日雙方不少賢明的外交家，對兩國關係的調整，東

亞和平的奠定，自不必就此灰心失望；不過因爲日本是侵略國，主動國，所以這件事的重心關鍵，在日而不在中。

換言之，卽有賴於日本者多，有賴於中國者實少。話雖如此，我們也不是全無責任的：「慢藏誨盜」，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我們知道和平之道在「防盜」而不在「貽盜」，我們就應該覺悟我們已往對和平的誤解與失責，今後萬不敢一誤再誤，一錯再錯。況且華北民衆早已寧死不屈的決心，如果政府再一讓步，不但不能使得步進步的日本「就此滿意」，更會迫着華北的人民鋌而走險，那時政府不但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同時更是東亞和平的罪人了。

或者有人要說，日本硬要而我們則硬不給，結果硬對了硬，尖對了尖，豈不要決裂麼？我們的答案是：中國不欲獨立存在則已，要想獨立存在，這個硬對硬尖對尖的衝突是永遠不能免的。今日我們答應他五省獨立，如果他在十年以後再要求華南獨立，也許我們能作十年教練，十年生息的好夢。但是如果他緊跟着明天就要華南獨立，我們

是不是忍痛再讓一步，而自己退守到帕米爾高原上去呢？

況且一再的畏縮讓步，是我們自取滅亡；而「僵局」衝突却不見得就等於決裂，惹起戰爭。我們須知日本之所以貪而無厭，是因爲他可以「不戰而取」。如果我們明白的表示寧戰不與的決心，在東北尚未完全消化的現在，日本也何嘗不覺得戰爭是一件兩不合算的事？如果說到「面子」，我們更不必過慮，外交官的頭腦，絕不似克欽先生想像的那樣「太熱」，縱有時表現得很熱，也不過是裝腔「唬」人。因爲，他們的冷熱體溫表，不是感情，而是算盤。況且日本人最重利害，最不講體面，日韓人民在中國販賣「白」「金」，開設「俱樂部」，弄得醜聲四揚，體面全失，而日本政府並不經意，毫不約束，那麼一個侵略未遂，又算得什麼丟臉？如果有人說，「日本的臉與中國的臉不同」，我只好說，「反正中日關係是一個臭膿癰子，早破一天，也不過落得早出臭膿早放心」，我們又何必「惜膿而養瘡」呢？

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侯封祥

九一八事變發生，連續的失掉了東北四省的土地，於

是國人的目光轉向西北，開發西北的聲浪一時高唱入雲，

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討論開發西北的文字，要人們也有許多到西北去考察。真的，西北是中國文化的策源地，是國防前線，是應該開發的。不過自從開發西北的聲浪傳出

來之後，到了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開發的成績，除了隴海路西展，西蘭公路築成通車，和渭惠渠，涇惠渠幾處水利工程開辦外，此外較大的工作還見不到什麼。在喊着開發西北這幾年中，西北的民衆不單沒有得到什麼實惠，因為

朱德毛澤東殘餘股匪的竄擾，西北凋敝的農村更加破產，人民更加苦痛了。同時因為敵人的節節進逼，西北在國防上處的地位更危險了。我們回頭一想，原來前幾年的開發西北，只是一種口號，一種觀念。事實上政府並未拿出大力量來開發西北，因為追剿共匪，由江西而湖南，而四川，雲南，貴州，得到了整理川滇黔的機會，可以說政府最近二三年的精力是放在開發西南的工作上。又因為兩廣問題未能隨勦匪而解決，形成統一的障礙，政治上的隱憂，政府還得隨時堤防着。國家的大難在外患，其中心則着重在華北；爲着對外，不能不先安內，爲着北征，則宜先入南，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原不必怪。現在川滇黔的政治已上了正軌，而兩廣問題又徹底解決了，西南方面此後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在這華北極端危險的時候，國人的視線

，政府的實力，都應轉向西北來，使開發西北的宣傳口號，變成實際的動作。所以我們不禁喊着：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我們要開發西北，不要忘了一個前提：開發西北必須先保存西北。有了這個前提，再說明開發西北所以刻不容緩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軍事的，或國防的；第二個理由是政治的，或民族的。

現在先說第一個理由。自從日本佔領東北四省之後，節節向前進逼，塘沽協定成立了，敵人據長城之線，居高臨下，反客爲主。不久冀東二十二縣成立了偽組織，不久察北六縣在偽軍的進佔中也爲敵人所有了。目前察北偽軍西進，綏東告急，敵人又強在包頭設飛機庫，在阿拉善旗設特務機關。在外交方面，日本始終保持廣田三原則中的「共同防共」，大公報記者已指出日本所希望的防共是強拉着中國共同防俄。這一切都在說明日本志在貫徹滿蒙政策，由熱察綏而寧夏而新疆。這樣可以隔斷中國與蘇俄的關係，南下可以侵中國，北進可以包圍蘇俄，進攻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日本這種野心，不必詳說，明眼人都會看到的。但不論敵人的野心怎麼樣，我們現在已到了退無可退的生死關頭了，一寸一尺的土地不容我們再失，這是

全國人一致的要求。所以我們希望政府速將經營西南的軍隊大量的開往西北來，作開發西北的開路前鋒。從華北的大勢看，我們能把陝甘晉綏寧青各省守住了，充實起來，敵人必不敢前進。冀察特殊局面慢慢的也會轉變過來。即使戰爭發生，冀察有變，相信華北可以不失。

第二個理由是政治的或民族的。西北各省中民族很複雜，文化也落後。在名義上雖隸中央，實際則危機重重。以蒙族論，察北失陷之後，內蒙王公受敵人的誘脅，百靈廟蒙政會變質，烏伊兩盟在綏境另成立蒙政會。敵人仍在四出活動，目的在造成一蒙古帝國。其次，陝甘寧青新各地回民很多，敵人久有計畫造一回教國，俾與土耳其相接近。回民性強，加以宗教之故，果敵人計得售，西北必與東北同一命運。現在政府在西北之政治勢力僅限於蘭州以東，其他僅存名義，甚至名義且不能保。欲改變這種情勢，必須由政治方面着手，提倡教育，發展交通，溝通民族意識，使邊疆民衆逐漸與內地民衆連成一起。有了這一步工作，敵人再去誘惑威脅，也無能爲力了。

開發西北，必先保存西北；保存西北，則惟軍事是賴。在這裏我們要指出來的，用軍事開發西北，莫善於軍屯政策。用軍事開發西北，在國防上說即是對抗敵人。對抗

敵人是一件大的工作，漢之對匈奴，宋之對遼對夏，都是相持很長的時日。所以我們現在也必須作持久的打算。實行軍屯，則土地與士兵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日子久了，更可以增加其抗敵的潛勢力，此其一。現在全國軍費佔歲出之半，目前全國統一，軍隊應大加改造，且應使之從事生產。實行軍屯，則餉精有自，既免運輸之勞，且可減少國庫開支，此其二。西北殘匪，仍在猖獗，在邊陲荒涼之區，非從根本着手，不易收肅清之效。實行軍屯，則可以軍事力量撫輯流亡，開闢交通，修築礮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收效於江西者，極須施之於西北，此其三。開疆制敵，實行軍屯政策者，歷史上不乏實例，最著者則爲漢明兩代。漢武帝屯田車師渠犂，爲軍屯之始。宣帝時趙充國與羌人對抗，屯田湟中，卒使先零瓦解，甘青內附。明初即實行軍屯，由南而北，由內地而邊疆，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屯田有功，太祖下令激勵士卒曰：

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

後來經營陝甘，經營遼東，都以屯田爲根本政策，洪武實錄中記載甚詳：

戶部尚書趙勉言：陝西臨洮，泯州，寧夏，洮州，

西寧，蘭州，莊浪，河州，甘肅，山丹，永昌，涼州等衛軍士屯田，每歲所收穀種外餘糧，請以十之二上倉，上從之。因命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務盡力開墾，以足軍食。

經營遼東時，所需軍餉，向由海道，後來因為供費浩繁，也改屯田。遼東志載：

初大軍衣量之資，仰給朝廷。衣費則令山東州縣，蠶運布鈔棉花。量給由直隸太倉，海運至牛家莊。供費浩繁，冒涉險阻，始制屯田。

靖難以後，成祖北遷，軍屯政策，有增無減。明史食貨志謂：

於是（永樂時代）東自遼東，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

以上略舉漢明屯田事跡，明初到現在不過五百多年，其在邊疆設衛的目的在乎防寇，軍屯則所以足食。這種政策的工效是不難想像出來的。

總括上面這些話，無論從內政上看，從國防上看，開發西北在目前是刻不容緩的。開發的步驟，應該是先軍事而後政治，先國家經營然後才可以招致私人的經營。在軍

事進程中，軍屯是一種很值得考慮的政策。歷史事跡，歷歷可尋，現在敵我情形雖與古不同，古人實行軍屯的意義似應可取法。翁文灝先生在他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文中（本刊第三第四號）把西北可以開墾的地方分為六個區域：（一）渭河平原，（二）綏遠平原，（三）河套平原，（四）寧夏平原，（五）甘肅西部，（六）新疆。六區面積約四萬七千方哩，可以移八九百萬人。政府要能在這些地方分設屯墾區，實行軍屯政策，相信數年之後可以收相當的功効。當然，這是一件大的事業，必須經過專家的設計和研究，然後才可以定可否。我在這裏只是提出一點書生的意見，以備關心華北或西北的人們的參考。說到這裏，我又想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東北統治者，他也曾想到一旦有事，南滿一帶是守不住的，所以計畫鞏固後方，設興安屯墾區。可惜從事未久，巨變乃作。現在的西北，領土主權尚屬於我，正好及時開發。鞏固了西北，即所以保護冀察；開發了西北，才可以談到收復東北。蒙古平原和西北平原在歷史上是漢族與異族馳驅的場所，蒙古的騎兵可由此南下江漢，西出天山。將來的戰爭，這一線無疑的還是一個大戰場，我們能先佔一着，實行軍屯，作種種軍事準備，戰事發生，敵人兵少不敢前進，兵多則首尾難全，這

是制勝的先着。

現在西北危險極了，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浙江糧食消費的一個特殊習慣

張培剛

浙江是一般人認為糧食不足的一個省份，可是究竟不足與否，或不足到什麼程度，還得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浙江儘管自產不足以自給，要仍不失為我國產米最豐多的省份之一。現在先不討論這個大問題，僅將浙省的一個特殊消費習慣提出來說一說，或許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吧！

大家都知道浙江的精華是在浙西（包括舊府杭，嘉，湖所屬各縣），而這個糧食消費的特殊習慣便剛好發生在浙西區域，尤其是在嘉湖二屬各縣。浙西毗連江蘇，同為我國著名的平原區，土質良好，極宜於耕植，而河道縱橫，密如蜘蛛網，尤便於灌溉與交通。物產以絲米二項最著名，其中產絲之平湖縣及產米之嘉善縣，素有「金平湖，銀嘉善」之稱，富庶可知。浙西的居民有一部分是從外縣（溫，台，紹三府所屬各縣）或外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移來的，俗稱「客民」。據稱因洪楊亂後，浙西本地人民死亡殆盡，故從外地移入大量人口。約計客民占浙西人口，各地由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六不等。這些

客民都是年少力強的，極能耐勞吃苦，因而他們以種田的居多，而且他們的經營也較原籍本地的「土民」為好。土民眼高識遠，他們寧願放棄一般農作物的經營而專從事於植桑養蠶或織綢，因為後數者工作輕而利益大。這種土民與客民謀生方法之不同，是我們理解浙西特殊消費習慣先得明瞭的。

其次，浙西出產的稻米種類之不同，也是須加注意的一點。在嘉善，嘉興，平湖，崇德，海鹽諸縣及吳興縣東部，水道貫橫最密，灌溉最稱便利，所以他們生產的稻作和江蘇松江吳江等縣相同，均以粳稻為主。因為粳稻自插秧到收割經過時間極長，常在一百五十天左右，如無良好的水利作保證，便不能有好的收成。但在消費上，粳米形圓性粘（普通都用其作年糕），既易脹飽，又難消化，尤其是對於養蠶織綢的人民更覺得「吃不消」。所以他們只得另圖良法。在吳興縣西部及長興德清諸縣，水利較差，故多種秈稻。因為秈稻經過的時間較短，一般都是在八十天

到一百天之間，因而免除旱荒的可能性較大。黏米又稱尖米，象其形，無甚粘性。唯浙西人民還是覺得非變一變花樣製造一番便不好吃。

在梗稻生產區域，人民消費的糧食是加工製造過的「冬春米」，糧市上稱「冬雙米」，俗稱「黃米」，以其色黃之故。這種米的做法有多種，普通是：第一步用竹席在地上圍一大圓屯形，內可容米一百石；第二步在圓屯底下墊一層稻草與粳糠（山谷製成糙米之粗糠），以免地下潮氣侵入；第三步將曬白了的梗米，每百石加以白糠（由糙米碾成白米之細糠）五担到十担（如欲黃色深則多加糠，否則少加。）攪合之，倒入屯中；第四步上面覆以粳糠十數担，使屯中米不致透氣。這樣過了兩個月或三個月，揭

開圓屯，其中白米便因發酵統變成黃米了。農民或米商做米的時候都在冬天，所以稱「冬春米」。這種米既和糠攪在一起爛了幾十天，所以有些糠味。初吃的人真覺得格格難入口，可是浙西人民都吃得津津有味。冬春米的好處，據當地人說：第一是香，即外地人不慣聞的糠味；第二是鬆散，做飯較容易；第三是粘性完全失去，易於消化。其壞處，據我們觀察：第一是損耗白米，即做出來的黃米不及原來白米多，損耗率約為二%—一〇%。第二是不易儲

藏，白米普通可儲藏一年到兩年，冬春米僅半年，如果到一年，便要發生腐蝕的危險。第三是減少營養成分，因為經過一次爛閉，米的潤澤完全失去，養分也許要失去許多，故吃起來很覺乾澀。自然，冬春米的滋養力是否不如白米，尚待專家予以分析與研究，不過由浙西人民生得「秀氣有餘，而強大不足」這一點來說，冬春米的養分較差或許可以斷定。（據云蘇州人也吃這種米，如果此是實情，那更多一證據了。）第四是不耐餓，因此浙西人民吃飯次數特多，每天由四餐到五餐不等；常見農民在工作最起勁時，因肚餓只得停止工作回家吃點東西再說。這雖然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享受，調劑他們工作的疲乏，但總有點妨碍農田工作，並且不經濟。

考粳稻產區居民食冬春米的原因，由前所述，當是由於它較白米易於消化。但查我國產梗稻的地方並不限於浙西，為何在別的地方並不一定吃冬春米呢？說到這裏，我們須得考察浙西人民的工作狀況。前面說過，浙西的土民多以植桑養蠶織綢為業，這種工作不需大力氣，吃粳米便有停滯不化的危險。就是種田的土民，也都因河道四方貫通，出進都用船隻，並且在農田經營上利用畜力的程度很高，所以樂於食用極鬆散而又易於消化的冬春米。但我們

却要注意：客民大多不慣於冬春米的氣味，又因做的是「粗重生活」，所以他們有的是賣出粳米，買進秈米充食；有的自種秈稻，留為自食。（當然土民也有吃秈米的，客民也有吃冬春米的，但居少數。）除浙西數縣外，吃黃米的地方僅紹興縣的沙地而已。

在浙西秈稻生產區域，人民吃的是「蒸谷米」，其色略較白米黯淡，表形亦較粗糙。這種米的做法：第一步用土磚或青磚堆砌一個灶，以能放置二鍋或三鍋為最適宜，灶邊設一風箱，便於抽風吹火；第二步鍋中置木蒸，將谷倒入蒸內，下面燒柴生火將谷蒸熟；第三步將蒸熟的谷數担或數十担聚成一大堆，周圍覆以稻草，使內中發熱；第四步隔一天在陽光下曝曬，曬乾後磨碾成米。據云晒谷這層手續很不容易，需要技巧，如果晒得不均勻，有些太乾，有些帶潮，磨碾時便易成碎米。這種米因係先將谷煮熟，再行磨碾，故又稱「熟米」，普通秈米則稱「生米」。蒸谷米的好處：第一是鬆散，易於下咽；第二是由糙米出精米的程度較粳米及普通秈米為高，計糙米出精米的百分率：粳米與秈米普通由八五%—九五%，蒸谷米則由九五%—九七%；第三是出飯程度亦較粳米與秈米高，約高七分之一；第四是煮飯易熟，可省若干柴火。蒸谷米的短處

也有幾點：一是米的香味完全失去，若冬春米尚有獨到的糠皮味，蒸谷米則「味同嚼蠟」；其次是不易於保藏，因已經煮熟之故；其三就皮相觀之，其滋養力或較冬春米略強，但恐怕還是不及普通的白米。

浙江食蒸谷米的區域較廣，除浙西數縣外，杭州市及其附近各縣亦有食之者。杭州食蒸谷米的多為工廠工人，做重活的苦力，及學校的學生。但這都是因為廚飯或飯莊打經濟的算盤，蓋一來蒸谷米出飯程度高，可以少費米；二來蒸谷米易煮，可以少費柴；實則食者對於蒸谷米並無特別好感。

浙西的這種糧食消費方法，在我國食米區域可算是特殊的了。其給予米糧的損耗，人民的體質，糧食的儲藏能力等等的影響如何？此種方法是應該推廣抑應該制止？這都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十，二十，南京。）

顧毓琇著

中國科學化問題

秉農山等著

科學與中國

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北平分會編印
北平西單報子街七十六號出售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